

柔弱中的刚强:晚清烈宦寇连材(1) ◆ 陆其国

要向慈禧最后冒死一谏

梁启超在寇连材小传中写道,寇连材是北京昌平人,从小聪明,脾气梗直,“年十五以奄(阉割)入宫,事(服侍)西后(慈禧)为梳头房太监。甚见亲爱,凡西后室内会计皆使掌之”。寇连材年少时经阉割后进入紫禁城,因得到慈禧宠爱,遂成为慈禧梳头房太监。后来随着慈禧对寇连材的进一步信任,又把自己屋内的经费收支一并交给他管理。然而慈禧怎么也不会想到,就是这个在她面前看似柔弱、自称“奴才”的太监,后来针对她做出的一系列与社会进步相左的行为时,竟表示“大不谓然”,并因此向她“屡次一谏”。当时慈禧尽管恼怒于寇连材身为太监,竟敢对她说三道四,口出狂言,但最后还是念其“少而贱”(年轻且身份卑微)而饶了他一命,只是对他严加痛斥,然后把他贬黜到其他部门打杂。直到一年过后,才重新把他召回身边。

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中方战败。接着中日签订《马关条约》,清政府对日割地赔款,丧权辱国。寇连材“日愤懑忧伤,形于词色,时与诸内侍叹息国事”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十月,又见慈禧“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造谣言,称皇上之失德,以为废立地步。又将大兴土木,修圆明园以纵娱乐。君(寇连材)在内廷大忧之,日夕皱眉疑虑,如醉如痴”。以至众太监都认为寇连材不是疯了就是病了。连慈禧见到寇连材,也对他作如是观。梁启超描述道:“丙申(1896年)二月初十日早起,西后(慈禧)方垂帟,君(寇连材)则流涕长跪榻前。西

说起来确实有点令人不解,同样都是希望慈禧改革弊端,拿出措施,推动社会前进,说起谭嗣同等“戊戌六君子”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但不知为什么,人们对比“戊戌六君子”早两年牺牲的寇连材却知之甚少。倒是“戊戌变法”的

后揭帐叱问何故?君哭曰:‘国危至此,老佛爷即(使)不为祖宗天下计,独不自为计乎?何忍更纵游乐生内变也!’西后以为狂,叱之去。”显然,这个已经有过教训的太监,竟敢继续如此大胆忤逆,居然还到她的床榻前进谏,慈禧若不是因为寇连材病了疯了,这次应该不会再次饶他,岂是骂一声“滚”就肯善罢甘休。

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,接下来,寇连材说家中有事,一连请了五天假。原来此时寇连材已暗下决心,要向慈禧最后冒死一谏,他这次请假回家,一是向家人诀别,二是将一本笔记托付给弟弟(一说哥哥)保存,里面是他多年在宫中做太监记录的私人档案。他决心既定,家人哭求也没能拦住他。五天后回到宫里,寇连材又把自己的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分送给了其他太监。之后寇连材就向慈禧呈上一份致命的奏折。他自然明白,随着这份奏折递呈给慈禧,他也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慈禧。这份奏折主要内容有十条:“一请太后勿揽政权,归政皇上;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(软禁)皇上。其余数条,言者不甚能详之,大率人不敢开口之言。最奇者末一条言皇上今尚无子嗣,请择天下之贤者立为皇太子,效尧舜之事。”今天看来,这最后一条建议简直就含有劝慈禧“禅让”,以实行“全民选举”的意思,这不分明是要慈禧“下台”吗!显然,寇连材

此举已不是一般的“出位”,简直是用刀子捅慈禧!对此,梁启超也不由感慨道:“其(寇连材)言虽不经,然皆自其心中忠诚所发,盖不顾死生利害而言之者也。”暂且不去对寇连材这份奏折作思想评判,但就他身为太监而能作出此举,便不难想见他得拿出多大的勇气。以致慈禧看到这份奏折,都不敢相信这是她曾经宠爱的太监寇连材个人所为。于是,盛怒之下的慈禧当即将寇连材召来,厉声责问道:“汝之(奏)折汝所自为乎,抑受人指使乎?”寇连材回答得斩钉截铁:“奴才所自为也!”这样的口吻,一定让慈禧觉得寇连材怎么看怎么不像奴才,倒更像是光绪皇帝的“代言人”。而且越是这样认为,慈禧越是希望“审讯”能有所突破。这时,只听她厉声命令寇连材道,这份奏折既然是你写的,那你给我复述一遍里面的内容。结果寇连材岂止是复述,简直是一字不拉地把那份奏折全文背诵下来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,慈禧已不想再在这一问题上纠缠。于是,接下来便有了慈禧和寇连材的如下对话:慈禧问:“本朝成例,内监有言(政)事者斩,汝知之乎?”寇连材答:“知之。奴才若惧死,则不上折也。”寇连材的回答,分明与后来的谭嗣同那句“中国革命之流血,请自嗣同始!”有异曲同工之况味。一直以“奴才”自况的寇连材看似柔弱,

但他的柔弱是刚强掩隐下的柔弱。看看寇连材就义前的神情:“临刑神色不变,整衣冠,正襟领,望阙九拜乃就义,观者如堵。”如此形象,不是柔弱的刚强又是什么!其实,寇连材从骨子里藐视慈禧的强势。他明知太监不准“言事”而偏要言,并敢于上那份不悻罹祸的奏折,分明就是刚强的凸显。与慈禧靠权势表现出来的强硬不同,从寇连材身上折射出的,是一个人的内心的刚强。梁启超所以为寇连材作传,正是看到了后者身上的这一点。诚然,梁启超在记述寇连材的史料中,难免留有其本人“保皇”思想的印痕,甚至他的赞佩寇连材,也多是从这一立场出发,但他毕竟为历史留下了在推进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改革历程中,一个看似柔弱的太监寇连材的刚强形象。

然而,读梁启超为寇连材留下的珍贵史料,我也读出了诸多的问号。比如关于寇连材的生年,以及他的家世背景,他为何当太监,这中间经历了哪些曲折,他内心又是怎样想的,尤其是他支持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是什么,是什么支撑着他敢于挑战慈禧的权威等等,这里面应该有着太多的故事。果然,一篇近似口述档案的文字,解开了我以上疑问。这就是《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》一文,作者寇长城写道:“寇连材乃是我的亲祖父。我们家族和乡亲中,至今仍然传颂着寇连材的事迹。”

我很是惊讶,太监既经阉割,寇连材怎么会有亲生儿女?寇长城写道:人们知道,太监是没有亲生儿女的。寇连材怎么会有亲生的子孙后代呢?这要从他的家世说起。他原名寇成元,进宫以后被赐名为寇连材。一八六八年,生于直隶昌平州(现在是北京市昌平区)南七家庄,家境小康。其父寇士通,粗通文墨,秉性豪爽,好打抱不平,为受欺压的穷苦农民出气。寇连材读过几年私塾,稍大即边务农边自学,不仅读了经史子集,还通过在家里做事的亲友,借阅了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写的书籍报章。加之京畿消息灵通,对于朝廷的帝党后党之争,以及列强的步步侵略,也多有所闻。寇连材深感清政府的腐败无能,国家积弱积贫,势有亡国之患……

那年头时兴早婚。寇连材十五岁时与铁匠营村张氏女结婚,生有两男一女。一八九一年,寇连材二十三岁时,他父亲寇士通为管穷朋友的事,与鲁疃村的大地主赵灿打官司。赵灿的儿子、女婿都在衙门里做事,官官相护,反诬寇士通有通匪嫌疑,结果有理的官司没打赢,自家的几十亩地被赵家批去,几乎倾家荡产。寇士通一气之下,卧病不起,含恨而死。

寇连材之所以敢于舍身向慈禧“死谏”,建议其“改革”的思想,一方面源于阅读“洋务派和维新派所写的书籍报章”;另一方面就是源于他亲眼目睹“清政府的腐败无能,国家积弱积贫,势有亡国之患”。当然,寇连材自家的遭遇,尤其是父亲的“含恨而死”,这一切皆成为他支持光绪变法维新的精神原点。

我是落花生的女儿

许燕吉

15.米粒

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,带个翻译,把几个房间看看,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,他明天就要房子。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,知道和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,更不要去求他们,二话没讲。他们走后,妈妈定定神,马上上30米外的郑家,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。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,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。客厅在一层,挺大,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,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。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擱,收拾的收拾,运输的运输。陈八叔停战后收回九龙去了,袁妈、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,像蚂蚁一样,穿梭来往,东西一放,马上回来,真叫马不停蹄。

下午,那个日本人又来了,一看,按住这件,说“这不要搬”,又按住那件说“这不要搬”。他一转身,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。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,我和哥哥抬起就走,重也顾不得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,出这么大力。晚上,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,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,靠在行李卷上,腿疼得没地方放。天亮又接着干,上午日本人来,基本上剩个空房子了。他愤愤地说了一句“我不要了”,扭头而去。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,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,直搬了一个月,还交了两边的房租。

朋友们说打仗以后,房租都停交的。妈妈说,人家肯给我们救急,就感激不尽了,怎能再前说后不算。这个月,我和哥哥基本上都在郑家这边。郑家最小的四个小孩儿,双生的儒钧、儒玉和他们的妹妹儒咏都是我们圣司提反的同学,还有他们一个弟弟,年龄也相仿,在一起玩得很开心。玩得最多的是“做戏”,随便出一个题目,大家就分分角色,自编自导自演起来,即兴发挥,却都是挺投入的。剩下我和哥哥二人时,就在那阳台上玩皮球。



不上学的日子也自由,快乐!

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战时组织了护校、救治伤员等工作,停战后也没解散,考虑到经过18天的战乱,各家都将断炊,便让住在近处的家属们也到他们的食堂吃饭。我家也享受了这份照顾。妈妈、婆婆、熊婆婆和我们兄妹共五人便一天三回往港大跑。好在近,下个坡再上个坡就到了。开始还分中餐部、西餐部,没过几天,外籍人士都被抓入集中营了,我们就吃中餐。排个队,先拿一只大碟子,往前,扣上一勺饭,再走,浇上一勺菜,就坐到饭厅的餐桌上吃。这一份饭,对大小伙子是不够的,我们则嫌多些。人熟以后,他们就少给我们一点儿。

吃完去还碟子,再领一份生米回桌上去拣。这拣米的工作就由婆婆和我二人来完成。米里有黑的米硬壳虫,白的细肉虫,绿的、黑的霉米,还有稗子、稻壳、沙子、小土块儿。得把米倒在桌上摊开,一点点地扒拉着拣,五份米也得拣好一会儿。若有没去壳的,就用指甲剥出米粒来,一颗也舍不得扔掉。有时候也有大学生来跟婆婆说你好话,把他那份倒给我们拣,婆婆都没拒绝过。拣干净后,婆婆还要拿个小簸箕簸一遍,绝对可以食用才去交回。饭厅的服务人员也都是大学生,对我们这一老一小总是笑脸相迎。在港大吃了一个来月,日本人开了粮站,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,港大的特殊照顾也就停止了。

买米的任务是袁妈和我两人的。粮站在下面的般合道。袁妈是天足,能走路,带上我是因为她不会说广东话。头天去买不到,第二天一早就去,在粮站门口排着队,慢慢就来了许多人。袁妈一手拉着我,怕挤散了。粮站的人怕人多乱挤再出事,就拿支粉笔在每人肩上写个大大的号头,没排队的不给号,写够号头就叫明天来,这样迟来的人就散了,秩序也就好了。原来粮站的米有限,按供应量也供不上,供应量是每人每天老秤六两四,合现在就是四两,两百克,其他副食和油都没有。经常看见路边上躺着饿死的人,盖条麻袋,露出大黑脚板。

港大的蔡爱礼医生是台湾人,通日语,日本人把他叫到卫生课去任职。他念及友情,让我妈妈也去上班,好拿一份工资糊口。

1.出手却是不凡

秋月。一个温暖而暖融的清晨。紫砂壶手袁朴生终于从躺了一个多月的病榻上站了起来,这天的阳光真好,伸手一攥,金亮亮的,仿佛有稻穗的香气。在湿润的江南,秋天总是阴雨绵绵,这样爽朗的天气,极为难得。给他治病的老古子樱郎中高兴极了,他特意给袁朴生带来一罐自己配煮的六君子汤,要他分三次服用。

袁朴生得的是伤寒症。本地人俗称“湿瘟”病。从这一年的早春开始,一种恐怖的瘟疫的幽灵,在江南乡村徘徊、蔓延、毙命者何止成千上万。古蜀街的紫砂窑场上,几乎每天都有暴死的壶手或窑工,被草席包裹着,抬到野外的坟地去深埋土葬。袁朴生年轻,体格健壮。开始他总是抢着去抬那些死去的工友尸体,有一天他从埋葬工友的野外坟地回来,突然头昏脑涨、上吐下泻,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。古蜀街上只有一家济世药房,店主虞世济郎中,四代家传,在古蜀街一带颇有口碑。但虞郎中即便日夜不眠连轴转,也无法应付每天在蔓延的疫情。这时候便有一个名叫古子樱的外乡人出现了。此人面白无须,说话细声慢气,操一口拗口的南腔北调,起先人们只知道他是个牙医,小门小户的,就在镇子北街葛家窑的边上。他给人拔牙、镶牙,成天笑呵呵,医道也还不错,尤其是收费很低,比起世济药房来,那真是便宜得紧。若是给做紫砂壶的壶手看病,大凡他看中的,分文不取,给把壶就行。久而久之,有些壶手来这里来看牙病,手里总是提着一篮子壶,让古先生挑。平时他背着个药箱,在龙窑附近转悠,看到壶艺精到的壶手,就会停下来与其攀谈。有时还拿出个本子记些什么。在窑场的壶手中,他最看重的,就是袁朴生。

先前袁朴生让古子樱镶过一颗牙。他第一次跨进古子樱的诊所,就感到此人古道热肠、见识颇广。说壶论道起来,常常妙语连珠,与他倒是十分契合。其实袁朴生跟世济药房的虞郎中交情也不薄,古蜀街上的人都知道,虞郎中也是个铁杆壶迷,平日与袁朴生多有切磋。但相比之下,古先

生更让他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而古子樱待他,则一见如故,仿佛一个失散多年的知己朋友。究其根本,大约也还是壶的缘故。古蜀街紫砂窑场上,壶手成百上千,退而其次者,做粗陶的如缸、瓮、盆、罐、碗、钵之类的工手,则不计其数。一个壶手要在这庞大的群体中脱颖而出,进入收藏级别,殊为不易。太多的艺人其实就是个匠人,大家依葫芦画瓢样,混口饭吃而已。

袁朴生年少而不气盛,出手却是不凡,两年前,他的一把莲子牛盖壶,就卖了二两银子,这在紫砂业界非常轰动。其时普通的壶手,一把壶充其量几十枚铜板而已。那把莲子牛盖壶的买主,乃是隐居于古蜀街的前清进士陶半坡先生。陶先生号称隐园老人,早年官至从六品,中年弃仕归田,朝野皆高看他几分。他性情孤傲而清高,是那种大隐隐于市的半仙之人,据说他字画俱佳而惜墨如金,且偏爱紫砂古壶,常叹今人所制,皆大路行货,不可与古人比肩。在壶手遍地的古蜀街,但凡能让陶先生看中一把壶,那壶手就等于是鲤鱼跳龙门了。有一日陶先生难得地在窑场上走动,恰巧葛家龙窑开窑,陶先生在陶器堆里看了半天,轻叹一口气,转身欲走时,突然眼睛一亮,他在一把莲子牛盖壶跟前站住了。一旁的烧窑师傅武小够看了一眼壶底的印款,赶紧把袁朴生叫来,说壶就是这位年轻人做的。袁朴生看了他一眼,笑了笑,说这壶我买下了。家僮就盘出二两银子,扔在袁朴生脚下。

要说出名,袁朴生从那时起就算出名了。

古子樱告诉袁朴生,几年前他在上海落脚,朋友邀他喝茶,见到一把柱础壶,神气清朗地站在面前,让人宝爱不已。朋友告诉他,壶手名叫袁朴生,此人前途无量。之后许多日子,那把壶老是在眼前晃荡,因了那把壶,他就奔江南古蜀街来了。

袁朴生刚病倒时,亏得虞郎中及时赶到。当即配制桂枝汤与生姜泻心汤,让袁朴生轮番服用,然却见效甚微。

